

## “Desolated and Deprived”:

a CDA Approach to Liu's Discourse

## Errance, Solitude, Dénuement :

Analyse critique du discours du procès de Liu Yin

“漂泊孤伶，一無所有”

——對劉穎案的批評話語分析

Chen Songsong

陳松松

Received 9 September 2006; accepted 1 January 2007

**Abstract:** Language and society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as every change in the society is reflected in our languag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ety. We made a CDA analysis on the announcements Liu made in her prosecution against Li, a famous anchor in China, following a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pproach proposed by Fairclough in his *Language and Power*, and cognitive method as a supplement,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is buried under the language.

**Key words:** CDA, social ethics, narrative, ideology, profit-loss scheme

**Résumé:** Il existe une relation inséparable entre la langue et la société et chaque changement social se reflète dans la langue. En tant qu'un outil puissant d'analyse, l'analyse critique du discours joue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dans la connaissance de la société. Nous effectuons, en employant la méthode d'analyse sociale préconisée par Fairclough et la méthode d'analyse cognitive, l'analyse critique du discours du procès de Liu intenté contre Li. Avec le corpus de quatre déclarations de Liu Yin, nous nous efforçons d'explorer la conscience cachée sous la langue superficielle.

**Mots-clés:** analyse critique du discours, morale sociale, narration, idéologie sociale, logique de bénéfice et de perte

**摘要:** 語言與社會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社會的每一個變化都能在語言中得到體現。批評話語分析作為一項有力的分析工具對於認識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使用 Fairclough 所宣導的社會分析方法結合認知分析方法對劉某訴李某案進行了批評話語分析，語料為劉穎所作的四次公開聲明，盡力挖掘其表面語言背後所隱藏的意識。

**關鍵詞:** 批評話語分析；社會道德；敘事；社會意識形態；賺賠邏輯

## 1. 簡介

### 1.1 事件背景

2002 年下半年，一位女士向媒體投出一份重磅炸彈，稱某著名節目主持人與她有染，並將對他提出損害賠償訴訟。到兩年之後的 2004 年 11 月 18 日該女士撤訴為止，她一共發表公開聲明 4

次（包括第一次的向媒體爆料），共計 6000 餘字。在其所發表的文字材料中，有對事件的描述，也有對對方當事人的控訴和質問，語言使用從直接犀利到以退為進，足以反映當事人在事件中的心理變化。筆者認為使用批評話語分析理論對劉女士所作公開聲明進行深入剖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並相信此種分析會是有益和有啟發性的。我們主要的研究問題將包括：

她如何認識此關係本身？這反映了何種社會意識？

她如何通過語言構建自己的角色？

其語言反映她在社會中的何種地位？

## 1. 2 理論背景

批評話語分析 (CDA) 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隨著哲學的語言轉向和後現代哲學的興起，對話語進行解構開始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之一。Fairclough<sup>1</sup>於 1989 年出版的 *Language and Power* 標誌著批評話語分析作為一門學科的正式建立。批評話語分析的理論來源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社會學與哲學領域，代表人物包括 A. Gramsci、L. Althusser、M. Foucault、J. Habermas、M. Bakhtin、P. Bourdieu 和 B. Bernstein。另一個則是語言方面，N. Fairclough、R. Fowler、G. Kress、T van Dijk 和 R. Wodak 是其領軍人物。在語言分析上，它注重社會分析與歷史分析，大多數以功能語言學為理論指導，認為語言反映社會，同時又構建社會。就社會角度來說，它“不從純學術或純理論的角度，而從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出發，選擇最受壓迫人群的視角，並批評性的分析權力擁有者、對此應該負責者以及有能力與機會解決此問題者。”<sup>2②</sup>

作為社會科學，批評話語分析強調發現語言中隱藏的意識形態，發現語言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和發現語言中反映的社會變遷和社會階層、群體之間的鬥爭。“意識形態在語言中無處不在。”<sup>3</sup> 所謂意識形態指的是：“某社會對於他們的世界中何物存在（範疇化），世界如何運作（因果關係），以及分配給主體與過程什麼樣的價值（總體性的主張與範式）”。<sup>4</sup> 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

<sup>1</sup>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M]. London: Longman, 1989.

<sup>2</sup> Dijk, Teun A. van. *Racism in the Press*[M]. London: Arnold, 1986:4

<sup>3</sup> Kress, G.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A]. In C.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 London: Routledge, 1996: 15-31.

<sup>4</sup> Kress, G.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A]. In C.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Routledge,

語言也同時建構了我們認知世界的模式。但這個模式往往是隱藏的，不為人所知的，CDA 的任務就是結合社會學與語言學理論來解釋語篇，揭示這種隱藏的意識形態。

## 2. 批評話語分析方法

批評話語分析的分析方法以功能語言學為主要的方法論，注意力集中在話語產生的社會與歷史條件上，主要分析話語所具有的功能和其互文性等。近期學者開始探討認知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在批評話語分析中的作用。<sup>5</sup>

本文的分析將主要按照 Fairclough 的分析框架進行操作。其分析方法以 Halliday 提出的三大功能為基礎，將分析過程分為三個部分：描述 (description)、解讀 (interpretation) 和闡釋 (explanation)。描述主要是對話語所使用的辭彙、語法、修辭手段等進行闡述，並在解讀階段給出相應的分析。解讀與闡釋之間密不可分，甚至在有些地方會產生重合，但闡釋有其自身特點，即對話語和語境關係作深刻闡明。

Fairclough 將批評話語分析區分為三類，分別是：關注話語在社會結構中權力的作用，即意識形態的批評；關注單個語篇或者是個人談話的說服力，即修辭的批評；關注某個社會團體朝某種方向改變社會採取的話語策略，即關於戰略的批評。<sup>6</sup>

## 3. 對劉案的語料分析

劉於 2004 年 4 月 23 日向媒體發表其第一封公開聲明，其中包括其與當事人交往的全過程以及之後所發生事件的敘述。<sup>⑤</sup> 加達默爾曾說“語言對人的可變性並不僅是指目前還存在著我們可

1996: 15-31.

<sup>5</sup> Wodak, R. *Media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ety: assessing cognitive approaches in CDA*[J]. *Discourse Studies*, 2006, Vol. 8(1): 179-190;

Dijk, Teun A. van. *Discourse, context and cognition* [J]. *Discourse Studies*, 2006, Vol. 8(1): 159-177.

<sup>6</sup>轉引自施衛華. 社會的話語 動態的視角. 載于《批評話語研究》[創刊述評]. *外語研究*, 2005, 1:76-78.

以學習的其他陌生語言。對於人來說，語言本身就是可變的，因為它對於同一件事為人準備了各種表述的可能性。”<sup>7</sup> 在敘事中，講述者需要確定角色，分配聲音（voices）和建構自己的社會地位。<sup>8</sup> 這次的敘事是一個女性當事人自述的婚姻越軌故事，它將提供給我們“一個故事化的世界，幫助建立並維護關於女性與性的矛盾的意識形態。”<sup>9</sup> 她如何在故事講述中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身份的呢？我們試圖在下面進行分析。

### 3.1 越軌與受害

敘述以時間順序進行，從兩人如何認識開始，到最終“破裂”以至對簿公堂結束。有趣的是，從一開始劉就明確地指出自己是受害者，是整個事件中需要受到同情的一方——“做過流產、帶環手術，自殺過兩次……如今，我幾乎一無所有，不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而且還失去了原來的健康，患有腎炎、糖尿病、神經衰弱等疾病”。這為其所有的事件敘述定下了基調，也成為她要求賠償的原因。之後的敘述中她不斷提到自己所遇到的困難、艱苦和窘迫，“我幾乎一無所有，不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而且還失去了原來的健康”，“喪失家庭，喪失工作，精神痛苦，染病在身，居無定所，漂泊孤伶，一無所有”。邏輯上來說，在婚外情和失業等問題之間，我們找不到任何聯繫，為什麼在劉女士那裏，這種關係是如此理所當然呢？臺灣中央大學的何春蕤教授一針見血的指出，在我們的文化裏，男人從性得到力量和自信，女人卻得到羞恥和汙名。<sup>10</sup> 在這種關係中，女性總是被侮辱和被損害的，這就是劉女士的賺賠邏輯，在這場事件中，她認為自己輸了個徹底，賠了個精光。籍此，她為自己建構了一個弱女子的形象，一個被壓迫、被玩弄的身份。

<sup>7</sup>轉引自熊沐清。從話語轉換與春秋筆法看英漢敘事策略。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6:425-431。

<sup>8</sup> Wortham, S. Narratives in action: A strategy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1.

<sup>9</sup> Caldas-Coulthard, C. R. 'Women who pay for sex. And enjoy it': Transgression versus morality in women's magazines[J]. In C.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6: 84-103.

<sup>10</sup>何春蕤。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M]，臺北：皇冠出版社，1994。

### 3.2 過錯與責任

那麼，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劉女士是如何看待的呢，我們的社會和她的“常識”對她的敘述又作出了如何的要求呢？在兩人的關係中，誰應該擔負起責任？

#### 3.2.1 主動發起者

誰首先發起就應該承擔主要責任，這是中國文化最典型的邏輯思維。我們來關注她對兩人交往過程敘事所採用的視角。在敘事中，第一人稱視角常常用於自傳等體裁的文本之中，敘述方式直接、主動。第三人稱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切入事件，敘述變得客觀、被動，並且常常與敘事者缺乏直接聯繫。在劉女士的敘述中我們發現，儘管這是一篇關於她親身經歷的敘述，是一篇自述，視角卻多數是第三人稱的。在第一段的自我介紹過後，隨即轉入第三人稱，作為故事主角之一的她在敘述中卻被弱化成了一個被動接受的角色。對方的主動行為卻被一再強調，通篇的“他”讓劉在這場事件中的位置顯得弱小並似乎受到脅迫。幾次聯繫均以對方的主動為起點：“他忽然打電話到我家裏”，“他給我打過幾次電話”，“他身子向我靠過來”。即便是唯一一次主動的聯繫，也是因為第三人而被迫的：“為幫一個朋友諮詢假頭套的事”。被動的敘事是劉女士對社會壓力所作的妥協，也是達到訴訟目的的需要。被動和受迫是女性在這種關係中應該佔據的位置，敢於公開表達自己主動的婚外行為的女性將被視作異類和不道德的。如果違反這一點，觀眾對她的同情將蕩然無存。

#### 3.2.2 被動的角色

在用詞上，她十分小心地進行選擇，避免給人任何不軌妻子的印象。在述及自己的感受時，她是克制的，幾乎沒有任何感情的投入：“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大男人如此細心，言語中透著關愛，還是難得，所以當時我有些感動”。什麼也不說，默默去承受也是中國女性被認為應該具有的素質：“我沒再說什麼，自己一個人跑到醫院做了人流手術。”<sup>④</sup> 在與對方當事人的關係上，劉女士的用語是“長者的關心”和“老李”，表現出兩人如同普通朋友一般，所有的只是上級對下級關心和近似於同事的關係，男女關係被完全拋開。克制自己的情感，非婚姻的男女關係只能存在於工作關係之中，即使自己家庭生活不幸也應該如此，這也是我們這個社會和文化的邏輯。

### 3.2.3 經濟關係

我們由此完成了社會意識對於此類故事敘述所作要求的分析。這類敘事“儘管表面上是越軌，實質上卻是對道德價值的鞏固和加強。”<sup>11</sup>在我們國家，越軌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是有違倫理的，即便在此之前夫妻之間已無感情。另一方面，一個成功男人越軌或者近似越軌行為會被看作是很正常。這決定了女性在敘述越軌故事中必須小心謹慎，如履薄冰。

但是僅僅只是如此的話，那麼劉女士也就只是敘述了一個弱女子被欺負，尋求社會聲張正義的老套故事，這並沒有太多新鮮之處。然而故事遠遠比這有趣：劉女士進一步強調了她們之間的經濟關係。她重點說明“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他任何禮物，更沒有向他要過一分錢。”即便是有經濟往來也只不過是“並斷斷續續地給了我一點生活費。”強調這一點的理由，我們認為，在於如果女性在婚外關係中獲得利益的話，我們的文化就傾向於認為這種關係是女性主導和“已經解決”的了。和商品交易一樣，女性如果從婚外關係中獲利，那麼男性就被視為已經作出了“適當的補償”，她就不應該再要求更多。

### 3.3 媒體與大眾

在處理與媒體和大眾的關係上，劉的表現頗為令人尋味。7月30日，劉女士給媒體發出了開庭之後的第二封電子郵件，在這裏她再一次對事件作了簡略敘述，並述說了其在訴訟中的遭遇。

在訴訟過程中，劉所敘述的各方態度非常符合我們文化中弱女告官的故事模式：“部門機構……不是推託拒絕，就是挖苦、冷嘲熱諷、侮辱”，“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對方當事人“他沒有再說話，放下了電話。從那以後，他不再打電話來，也不再接我的電話。”並叫人電話威脅。而大眾則是“善良的人們一次次將我從死亡、崩潰的邊緣拉回”和“敢於報導事情真相的、對我以予幫助的、敢於直言的新聞工作者們”。

討好和徵求大眾與媒體的同情也許使得故事的發展幾乎毫無意外，但其真實意圖應是通過將大眾與媒體拉到自己一面從而達到使後者（大眾

與媒體）站在對方當事人（包括那些她敘述到的部門機構）的對立面的目的，因為她自己與對方當事人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而選擇這種敘述的最終目的則是為了在輿論上孤立對方從而迫使對方向她妥協——這是一種不戰而勝的策略。

### 3.4 傳統與現代

我們到此已經基本分析明瞭了劉作為“受害者”和“求助者”所必須完成的各種敘述，其目的實現的比較成功，媒體幾乎一邊倒的把矛頭指向了對方當事人。然而令我們不解的是，如果這是一宗強姦案，那麼劉女士的敘述幾乎是毫無疑義的可以將對方當事人告倒，也就符合了我們文化中關於相同主題故事的整套敘述模式。問題在於，這並不是強姦案，而是一宗婚外情案件，劉根本沒有理由取得所謂補償，那她作出此種敘述的目的又何在呢？

我們進一步閱讀，發現了更為有趣的事情：劉在敘述中提到“一方面要與我保持原有關係，另一方面又不肯負起責任。”這裏的責任是什麼呢？很明顯，是劉女士的訴訟標的——損害賠償。原來，講述這麼多的故事，目的無非一個，即對方必須為這種關係承擔責任，即對方必須作出經濟補償。她沒有像愛情故事裏的第三者一樣要求對方和自己步入婚姻，所求只是一點補償罷了。在今天這個經濟社會裏，“有損害就要賠償”乃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應當遵循的規則。在這樣的認知模式下，她的要求毫無問題、天經地義。然而，如果這種目的是直接明瞭的說出來的話，她將得不到一丁點的同情。我們的文化將會視此為“不知羞恥”。“善良”的大眾和“直言”的媒體會毫無例外的站到對立面。她從一開始就知道法律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而一再強調“法院並不能對人的靈魂、道德進行審判”。這與她先前強調兩者的經濟關係相輔相成，又互為矛盾，構成了一個複雜的文化迷題。如此一來，“越軌而受損”與“損害須賠償”這一對現代與傳統的賺賠邏輯在這個故事裏融合了起來。

## 4. 結論

至此，我們完成了對劉女士六千多言的分

<sup>11</sup>何春蕤. 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M]. 臺北:皇冠出版社, 1994.

析，結果令人深感有趣而又無奈。我們認為，這個故事是一個傳統和現代，東方與西方結合的產物。因為傳統，因為東方價值，她不得不強調自己的被動和弱勢；因為現代，因為西方價值，損害就必須給予補償，即使這種關係本身是不正常的也是如此。在傳統和現代兩種邏輯之間行走讓她選擇了這樣一條崎嶇的道路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她在撤訴聲明中提到克林頓總統也許只是個巧合，但在筆者眼裏卻有不無諷刺的味道。

### 注 釋

①本文中所用人名均為化名。

②本文中引用文均系筆者翻譯，如有失真，文責自負。

③對其語言材料進行分析並不代表本文作者認同劉的訴訟請求，分析僅供語言研究之用。

**作者簡介:** Chen Songsong(陳松松)(1980-)，男，碩士研究生，助教。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430079。

研究方向：語用學；話語分析；法律語言學。

**通信地址：**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Central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P.R.China.

中國湖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430079）Email: css@mails.ccnu.edu.cn